

文学批评家丛书

耽 潜 痴 水

缪俊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学批评家丛书

新潮启示录

缪俊杰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新潮启示录

新潮启示录 缪俊杰著 · 文学批评家丛书 ·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插页 285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094·741

定价：2.75元



目 次

DC29/11

新时期文学人物性格塑造的突破与超越	(1)
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流派初探	(19)
典型的规律与文学的探索	(44)
——关于文学创新问题的思考	
努力塑造当代军人的英雄典型	(61)
——浅谈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描写社会主义新人问题	
矛盾的法则与创作的出路	(84)
论新时期文学中改革者的形象塑造	(96)
封建主义的幽灵与时代意识的觉醒	(112)
——读近年来部分反封建主题的小说	
面对现实 刻意求真	(124)
——报告文学创作问题浅议	
文学的喜悦与期待	(130)
二	
论苏叔阳的创作	(135)
时代大潮推动着艺术的觉醒	(161)
——论潮清小说创作的突破与超越	

努力表现时代和民族的追求	(179)
——评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	
激情·意境·韵味	(193)
——葛翠琳的几部童话读后	
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	(202)
——读王蒙的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	
生活的奇异反差和人格的自我实现	(209)
——读李玲修的报告文学《问心无愧》	
一颗封闭的灵魂的复苏	(217)
——评彭见明的中篇小说《梨木梳子》	
当代意识观照下的农村图景	(224)
——读邹志安的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	
绘其状貌 得其神韵	(228)
——读明德的系列小说《河街人》	
别有洞天看新潮	(233)
——读李贯通的短篇小说《洞天》	
“辞达而理举 无取乎冗长”	(239)
——“全国微型小说大赛”感言	
奉献，灵魂的洗礼	(242)
——电视剧《她们和战争》观后	
现代意识在变革生活中闪光	(246)
——谈影片《咱们的退伍兵》的艺术特色	
保持对生活的追求力	(249)
——序中篇小说集《白楼女士》	
赣南山乡的风情美	(254)
——序《定南文艺作品选》	

众师古法 独出新意 (257)

——吴静山和他的中国画

敬意与祝愿 (259)

——《周扬序跋集》编后记

三

文学的新潮和作家的选择 (261)

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探讨 (280)

“现代意识”：值得探讨的一个理论命题 (294)

荒诞、魔幻与我国文学的走向 (304)

从“吞不下吐不出巨大的毕加索”谈起 (316)

评论的热情与清醒 (326)

四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 (331)

——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文艺思想札记

支持探索 鼓励创新 (338)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341)

——再谈文艺的探索与创新

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艺术 (344)

呼喊我们时代的史诗 (349)

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品格与修养问题浅谈 (352)

——答《文艺理论家》特约作者问

需要震撼心灵的时代曲 (359)

——从电视剧《新星》引起的反响说开去

开拓学术争鸣的新天地 (366)

要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369)

展望新时期文学第二个十年 (371)

五

中国古代乐论画论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 (379)
——在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后记 (401)

新时期文学人物性格塑造的突破与超越

我国新时期文学空前繁荣，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有了新的突破与超越，它标志着我国文学在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沟通的进程中，进一步走向成熟。认真总结这方面经验，对于推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有重要的意义。

—

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文体，发展演进到某一阶段，人物成了艺术表现的中心，小说家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和艺术重心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小说家追求的美学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因此，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成了判断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包括巴尔扎克在内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把人物性格化的小说推向高峰，塑造了文学史上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光辉人物形象体系。

作为人类文学的一种优秀传统，我国当代文学一直把描写人物性格、塑造艺术典型作为

自己美学上的一种高尚追求。我国新时期的文学也不例外，它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短短的十年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不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开拓，在人物性格的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也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突破首先表现在经过拨乱反正，批判文学上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对于文学本身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纠正了一度出现的对于人性的扭曲，强调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重新发现和确认了人的价值，从而在艺术创作中，把塑造活生生的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和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使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超越。

这种突破和超越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以及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人的自我存在价值。文学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基本职责的一种意识形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文学的主体应当是人。文艺创作应该把人放到历史运动的实践主体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中心，看作历史的主人。在美学史和文学史上，强调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塑造人物性格和艺术典型的重要意义，是对文学规律的一种尊重。应该说，“文学是人学”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个命题。我国新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艺术家，同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一样，在“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下，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说新时期文学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有着新的突破和超越，就在于从真正意义上恢复了“文学是人学”的本来面目，在艺术上实现了某种“回归”。

一种是从“神”到“人”的回归。在一个时期内，“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曾经被扭曲，或作了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推行“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把塑造典型人物简单地理解为只塑造那些反映社会本质的、代表某一阶级的共性人物。特别是把“英雄人物”抽象化为没有血肉的、没有灵魂的“神”或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得解放的标志之一，就是把“神学”还原为“人学”，把“神”还原为“人”。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许多作家开始用人的观点和尘世的眼光来描写人民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英雄。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启示》、《足迹》、《路标》，白桦的文学剧本《曙光》，邓友梅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以及丁一三的话剧《陈毅出山》等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笔触，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把这些领袖人物既作为人民的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作为“人”，展示他们的风采和丰富的性格内涵。这就突破了过去某些作品把领袖作为“神”来描写的框架，从“神”回归到“人”，打破了林彪所谓“几百年”、“上千年出一个”的神话，把领袖看作是一个群体的代表，看成是时代的产儿。

对领袖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塑造上的突破，为新时期文学中对“英雄人物”塑造开辟了一条新路。社会主义文学需要描写“英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号召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要勇于去描写“叱咤风云的战斗的无产者”。我们的文学要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英雄人物”也被过分

地理想化和“神化”了。写“英雄人物”就不能写他们的缺点，不能写他们的成长过程，不能写他们的失败，更不能写悲剧性的命运；英雄必须是“高大完美”的，纯而又纯的，所向无敌的。新时期文学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的突破，也是把“神”还原为“人”，把这些英雄写成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具有普通人七情六欲的、具有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新时期文学展示出，象彭其、陈镜泉（《将军吟》）、李辰（《两代风流》）这样功名盖世的高级将领，也有普通人的苦恼和困扰；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车篷宽（《开拓者》）、刘钊（《花园街五号》）、陈咏明（《沉重的翅膀》）、陈抱帖（《男人的风格》）、武耕新（《燕赵悲歌》）、李向南（《新星》）这样叱咤风云的改革家，也有普通人的错纵复杂的思想感情；象罗群（《天云山传奇》）、李铜钟这样赤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也有苦难的经历和悲惨的结局；象刘毛妹（《西线轶事》）、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这样为国捐躯的英雄，也有过那样突出的缺点和错误；象赵蒙生（《高山下的花环》）那样在战火中经受庄严洗礼的人物，也有过想当逃兵的不光彩的历史……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过去那种按照“三突出”模式塑造出来的“神”。文学创作上的这种突破，不能简单地被认为创作手法上的更新，主要是人们观念上的更新，是文学上当代意识的觉醒，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认识上的深化。没有文学观念的更新，没有认识上的深化，要达到这种突破和超越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种是从“鬼”到“人”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文学创作

中，作家坚持用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评价描绘阶级社会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观点和作法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同样使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的塑造受到扭曲。历次不正确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扩大的错误作法，把许多本来堂堂正正的人，打成“牛鬼蛇神”，也就是把“人”打成“鬼”。在文学中也相应地把“人”鬼化。新时期文学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的一个主要突破，就是拨正了这种错误作法，实现了从“鬼”到“人”的回归。这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把被诬陷为“鬼”（例如把我们许多好干部打成“牛鬼蛇神”）的人还原为“人”，把这些人物当作堂堂正正的人来描写。罗群作为被打入生活底层的“右派”，在那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岁月，自然是被当作“鬼”的，而作者却在新的意识观照下，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目光，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英雄，一个高尚的人，还原于他作为真正的人的本来面目。李铜钟被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在“人民的监狱”中丧生，过去自然是被作为“鬼”的，而作者同样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描写拨正了航向的党对他的平反昭雪，抚慰了这颗为人民事业而殉道的高尚的灵魂。第二种情况是，把那些失落了人的价值，被世俗眼光看成为“鬼”的人还原为人。《乡场上》所描写的冯幺爸，在梨花屯权势人物罗三娘之流的眼里是一只“狗”，他作为人的价值确实失落了，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变革，冯幺爸挺起了腰杆，重新象人的样子了，作家捕捉了生活所发生的如此严峻的变化，重新发现了冯幺爸作为人的价值。刘心武《如意》中的石义海，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一个极普通极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阶

级觉悟的人，他愚昧混沌，然而作家却发掘了他身上的人性，表现出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喊，重新发现了他作为人的价值。第三种情况是，把那些可以看作“鬼”的人物，也写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脸谱化地把他涂成“鬼”相。新时期文学中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或被批判的对象。比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郑百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冀申，《芙蓉镇》中的李国香、王秋赦，《花园街五号》中的丁晓，《故土》中的安适之等等，作者都没有简单地把他们脸谱化，把他们写成为“鬼”，而是通过对他们丑恶灵魂的揭露，把他们写成了活生生的富有性格特点的人物。从艺术视角来说，也是把“鬼”还原为“人”。

新时期小说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对于“人”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人在文学中主体地位的确认和艺术上对活生生的人的性格表现，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这是对文学中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有力的反拨。人物塑造上这方面的成就使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一种新的美学境界。

二

小说创作要塑造出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典型，就不能停留在性格描写的低层次上，即满足于表现人物表层的单一的性格特征，而是要求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把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人物性格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和复杂因素，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复杂性、丰富性，使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审美化的深度。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艺术典型塑造时，虽然要求性格的“某种特殊的形式”，要求表现出某种“定性”，但是他特别强调人物是“各种属性的整体”，强

调人物性格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这对我们研究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有很大的启发。目前西方的文艺理论在论述人物性格塑造时，也十分强调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例如，近三、四十年来风行于西方世界的具有权威性的理论著作，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著的《文学原理》一书，关于《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一章中，就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圆整”人物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物塑造有静态型、动态型和发展型的几种模式。认为“扁平”人物只是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表现被视为人物性格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而“圆整”人物则是一种动态的塑造，要求空间感和强调色彩，认为这种方法显然对塑造那些集中代表了小说观点和兴趣的人物的性格是必要的。无论是黑格尔的观点，或者是韦勒克、沃伦的观点，都强调小说描写人物，应表现出各种属性的整体，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我们描写人物性格和塑造艺术典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新时期作家正是在这点上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大胆的探索精神，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典型塑造上有所突破和超越，从而使我们的文学进入了更高的审美层次。

打破人物性格特征的单一化框架，把不同的性格因素和性格特征（甚至是矛盾的、对立性的特征）组成一种聚合力，把人物描写成为“各种属性的整体”，是新时期文学人物性格塑造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较早引人注目的是方之的小说《内奸》。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的典型形象。在田玉堂身上，显然包含着两种对立的、矛盾的性格因素。作为一个商人，为了赚钱，做的是不太光彩的

生意，他有商人的机灵和狡诈，甚至也有点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爱炫耀自己，说起话来七折八扣，这显然是一副商人面孔；然而这个田玉堂又有一份爱国心，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还讲义气，有荣誉感，更不做昧良心的事，有较浓重的民族意识和道德观念。这又是他的另一方面。这两方面矛盾对立着的性格因素和性格特点，有机地统一在田玉堂的身上，构成为一个“圆整”的性格。“这一个”田玉堂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典型，这对于过去“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或者商人典型应该如此这般的理论显然是一种突破和超越。陆文夫笔下的朱自治（《美食家》）和邓友梅笔下的那五（《那五》）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寄生虫式的资本家朱自治，他身上有着懒惰、贪吃等各种令人生厌的恶习；然而他的贪吃，美食而成精，成为“美食家”，他对于各种美食佳肴的精心研究，“化腐朽为神奇”，又对具有苏州特色的“饮食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从多侧面、多角度来描写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复杂的空间感和强烈色彩。那五也是一个寄生虫。作为皇室后裔，他处处摆出一副“龙子龙孙”的派头，充满着可怜又可笑的穷酸气；他悠悠荡荡，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丧失了起码的生活能力；然而社会生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又使他不能那样优哉游哉地活下去，他只好同三教九流一起胡混，搞点小小的行骗勾当。但是作者又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流氓无赖，或者是老奸巨滑的恶棍；他那寄生生活过不下去时，偶然也会产生改邪归正的念头；他曾羡慕过自食其力的武存忠“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趋炎附势”的“舒心痛快”的生活。北京解放之后，他也意识到“没有吃闲饭这一行了，看样子不劳动是不行了”。在他身上

“善”与“恶”的两极因素都存在着，这两种对立着的因素，就成为一个完整的“那五性格”。

打破艺术中的某些禁区，突破传统观念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性格中的对立因素，不仅表现在象田玉堂、朱自冶、那五这样一些本来就具有复杂性的这一层次的人物身上，而且还表现在过去被认为是“纯而又纯”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身上。魏天贵（《河的子孙》）、田家祥（《拂晓前的葬礼》）、李金斗（《桑树坪纪事》）就是这样具有复杂性格的党员、干部形象。作为魏家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魏天贵的大半生都处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当了党的支部书记以后，他性格中的对立因素更加鲜明地暴露出来。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热心为群众办好事，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受到挫折，使这个朴实忠厚的庄稼人逐渐变得工于心计，狡猾起来。他假借申请防洪专用粮来救群众燃眉之急；他用白水兑到酒里欺骗蒙古人，换回豌豆种进“黑田”以生产自救；他还昧着良心把贫苦农民郝三送进监狱以掩护众多的乡亲。在他的性格中，真诚与虚伪，质朴与油滑，为公与私欲，机智与愚昧，各种对立的因素统一在一起，从而使魏天贵成为一种“人鬼相兼”的矛盾复杂的性格。作者通过这个扭曲的性格再现了一种被扭曲了的现实。这一性格的矛盾性与圆整性，正是它成为典型人物之所在。田家祥也有一个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他的身上也有着对立的性格因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用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的话来说，他以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颓。同样是表现封建家长制的思想内涵，李金斗又具有与田家祥不同的特色。

在新时期文学中，不仅表现了魏天贵、田家祥、李金斗这样